

学术新视野

当代科学技术论译丛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 科学实践与 日常活动

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

著 【美】迈克尔·林奇 (Michael Lynch)

译 邢冬梅

CAMBRIDGE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当代科学技术论译丛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 科学实践与 日常活动

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

---

著 【美】迈克尔·林奇 (Michael Lynch)

---

译 邢冬梅

CAMBRIDGE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 / (美) 林奇著; 邢冬梅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9

(学术新视野: 当代科学技术论译丛)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SBN 978-7-81137-515-2

I. ①科… II. ①林…②邢… III. ①科学社会学—研究 IV. ①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239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9-025 号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Ethnomethodology and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ISBN-13 978-0-512-59742-5) by Michael Lynch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

——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

著 者 迈克尔·林奇

译 者 邢冬梅

责任编辑 薛华强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215006)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字 数 351 千

印 张 2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515-2

定 价 46.00 元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 致 谢

尽管是我写的这本书,但是对它的内容我不能完全归功于自己(否则【ix】我会感到羞愧)。这本书探讨了发展一种我称之为对科学实践研究的后分析研究方向的可能性。通篇应该清楚的是,这个导向深受迦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对情境性实际活动和实践理性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的影响(或许该说“感染”)。过去的20年,我得益于读解迦芬克尔撰写的大量未出版的手稿并且亲临了许多演讲和讲座,在其中他和他的学生讨论和证明了研究社会秩序产生的新颖的方式。我在这本书中参考的出版和未出版的著述仅仅涵盖我从迦芬克尔及其同事和学生那里学到的一小部分,这其中包括 Eric Livingston, Albert (Britt) Robillard, George Girton, Ken Morrison, Ken Libenman, Richard Fauman, Doug Macbeth, Melinda Baccus 以及 Stacy Burns。我最初理解常人方法论的努力不可估量地受益于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包括 David Weinstein, Alene Terasaki, Bill Bryant, 以及 Nancy Fuller, 和他们在一起,我共享了对“哈罗德(Harold)言说的世界中究竟有什么?”这一问题的抢先理解。迦芬克尔也读到了这本书的早期草稿,并且给出了特别的、有用的评注。

我对常人方法论和谈话分析的不同研究方向的理解还依赖于我从讲座、非正式的数据发布会议以及我与 Melvin Pollner, Gail Jefferson, Emanuel Schegloff, Anita Pomerantz 和 Harvey Sacks 的讨论中学到的东西。尽管在本书中我批判了一些他们的工作,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对他们的成就的认可。更近一些时候,我对常人方法论以及相关问题的理解得益于

和 Jeff Coulter, Wes Sharrock, Bob Anderson, John Psathas, David Bogen, Dusan Bjelic, Graham Button, Lucy Suchman, John O' Neill, Elileen Crist, Kathleen Jordan, Jeff Stetson, Ed Parsons, 以及 Edouard Berryman 的讨论和项目合作,我尤其要感谢 Jeff Stetson 的强有力的鼓励和支持,他阅读和评论了这部书稿的早期草稿,并且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维特根斯坦的著述都

【X】受教于他。无论是在广泛意义上还是在细节意义上,我都受惠于 David Bogen,特别是第六章,包括观点、例证以及合作撰写出版的修改过的相关章节和学术会议发言。尽管相关的章节是“我亲手”写就,但它们与我从许多的谈话和合作研究中得到的那些章节不可分离。

我对这些问题的涉及以及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关键性争论始终受益于与 John Law, Steve Woolgar, Sam Edgerton, Gus Brannigan, Andy Pickering, Trevor Pinch, Steven Shapin, Joan Fujimara, Bruno Latour, David Edge, Susan Leigh Star, Harry Collins 及其他我疏于提及的人的合作研究、编辑建议、批判性交流以及许多令人愉快的谈话。对于一种批判性意见交流,我还要感谢 David Bloor,相关的思想我已经吸收进了第五章。尽管在我准备这部书稿的过程中它来得稍迟一点,我还是受益于 1991—1992 年间在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的文化研究项目的访问教职。在我与 Robert Marc Friedman, Jerry Doppelt 和 Chandra Mukerji 合教的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核心研讨班上,学生和教师们之间的讨论和争论使我大开眼界。

这部书中我所写的许多东西是我从存储文件、手稿以及对各种各样的项目和论文的评述笔记的我的计算机硬盘中挖掘出来的。结果是,这本书的内容中我融合了分别独立发表的几篇论文的部分内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挑选了与本书的总体目标相关的章节、例证和观点,并相应地作了调整。

我还要感谢加速本书出版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纽约机构的编辑和工作人员,特别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所联系的三位匿名评论者,他们给予了我帮助性的建议和建设性的批评。最后,我要感谢 Nancy Richard,为她对一个社会文本的自私的作者在生活中无数小时充满爱意的支持、耐心和容忍。

## 中文版序言

我非常高兴为《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撰写中文版序言,并且非常感谢译者为之付出的努力。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把它作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研究的第一部分,并且计划在第二卷进行经验性的案例研究。第一卷(现在也还仅仅是第一卷)对当下科学哲学、科学史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流行的主题,主张一种经验性的、但不是经验主义的研究。诸如观察、表征、实验、测量、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区分以及自然和人工物之间的区分,都是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中熟悉的论题。但是,借助于迦芬克尔和维特根斯坦,我提出避开这些主题与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在一起产生的疑难,并把它们视为常人学研究(ethnographic study)的论题。在那段时间,我完成了几个这类研究,其他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从未把它们在第二卷中集结在一起。我并没有放弃出版第二卷的想法,但同样出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搁置一旁,我则卷入其他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通常与在波士顿大学、布鲁内尔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和我一起工作的我的前任学生和博士后助理合作进行。这些研究包括与科尔(Simon Cole)、麦克纳利(Ruth McNally)和若尔达(Kathleen Jorda)合作的关于刑事审判中DNA压型技术的用途的一本书〔1〕,以及与博根(David Bogen)合作的关于伊朗禁忌听证的证词分析的一部专题论著〔2〕。这些研究发展了在《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中勾画出的纲领,但它们也还致力于其他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也在继续进行《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中勾画的纲领的研究,这些研究特别体现在与布杰里科

---

〔1〕 Michael Lynch, Simon Cole, Ruth McNally and Kathleen Jordan. *Truth Machine: The Contentious History of DNA Fingerpr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2〕 Michael Lynch and David Bogen. *The Spectacle of History: Speech, Text, and Memory at the Iran-Contra Hear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usan Bjelic)合作进行的关于牛顿光学实验的歌德辨析的项目研究〔1〕和与马丁(Aryn Martin)合作进行的关于不同的活动环境和政治环境中计数活动的项目研究〔2〕。

在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之间熟知的区分的意义上,这些研究在视野上是微观的(我自己更倾向于称之为“分子的”),因为它们关注的是特定场景中运作的具体的实践。与布杰里科合作进行的研究,包括让读者进行简单的玻璃棱镜或者塑料棱镜的操作。尽管关注的是单个的案例和个人的行为,这些研究还是展示了无处不在的组织性现象。例如,计数和判断是寻常的活动,不仅发生在教室和研究中心,而且发生在许多非学术性场所。计数的操作如何从一个案例到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变化,受制于特定的偶然性,因此就有必要研究在特定的场景中数字如何产生和使用的问题。这类研究的关键点不是去揭露从前没有发现的社会活动,或者去展示隐藏力量的真相,而是要使用特定的案例和经历去批判性地重新审视熟悉的认识论主题。

无论是对认识论的研究趋势还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趋势,《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都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在这两个领域自1993年以来持续发展的同时,这种批判较以往更加适用。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谈话分析继续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的专业领域,这个领域与常人方法论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与此同时,在一些常人研究、谈话分析研究成果继续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上发表的同时,对工作的具体性研究(实验室研究)不再像其从前那样盛行,其实它们也从来没有像传言中那样盛行。对当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而言,对实验室研究的提及,始终注重的是其重要的叙事功能。对活动的常人学研究,受惠于一个既成的观点,即科学是在实验室第一线建构起来的。但是,更多的不是去探究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诸多成问题的特性,STS学者们几乎始终不变地把它们视作在几十年前就稳固下

〔1〕 Dusan Bjelic and Michael Lynch, “The work of a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respecifying Newton’s and Goethe’s theories of color”, pp. 52–78 in G. Watson and R. Seiler (eds.), *Text in Context: Contributions to Ethnomethodology*.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92.

〔2〕 Aryn Martin and Michael Lynch. Counting things and people: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counting. *Social Problems* 56 (2) 2009: 243–266.

来的观点。于是,他们意欲更进一步地推进发展规范性观点和伦理观点的研究局面或者“潮流”,并以此介入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当代争论和关注。在细节上对科学的实践进行持续的研究,于是就似乎是一种对过时的议程的追求,或者更糟,似乎是在享用作用于实际政治变化的 STS 研究的集体性智慧而逃避一个公民的责任。在规范性的 STS 研究中,或者在基于 STS 研究的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肤浅的和野心勃勃的言说中,所缺失的东西是:总的来说,实验室研究的一个教训是 STS 学者没有“拥有”赋予其研究和争论以生命的那种概念语词、本体论疑问和政治关切。例如,尽管 STS 的支持者有时也置身于提出政策建议的“专家”位置上,但这个领域本身对于专业性主张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基础。反倒是,那种专业性资源通常来自于学者们所参与的专业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领域,STS 对于引发一种有洞见的研究的确能够提供一种激励,但与取自于长期不懈的专业研究领域的资源相比,其能够提供的理论性和方法论的资源相当单薄。在许多要超越常人学研究的言说中(通常从一开始就没有兑现)缺失的东西是:常人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性要求是要与研究成员提出和陈述问题的方式妥协,这种方式与在学术性社会科学中讨论和争论的方式具有同源的形式。在《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中我主张,取代把 STS 视为一种新的认识论的基础,我们应该把认识论主题(观察、表征、测量等)视为“认识论话题”。我的康奈尔大学的同事迪尔(Peter Dear)为其历史编撰学研究独立地发展出一个恰当的术语:“认知编撰(epistemography)”〔1〕。为了扩展这个新词,我们可以说:无须创建新的“本体论”,我们可以进行“本体论编撰(ontographies)”;取代把 STS 设想为一种伦理学的基础,我们可以进行“伦理学编撰(ethigraphies)”。因此,在这本书中我所希望表达的意愿是:审视认识论的、本体论的和伦理学的关联,如何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活动的部分得到概念化、陈述和实施。今天,这个意愿保持着和以往一样的确切性。

2010年4月1日,于康奈尔大学

---

〔1〕 Peter Dear, “Science studies as epistemography”, pp. 128 - 141 in J. Labinger & H. Collins (eds.), *The One Culture? A Conversation about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目 录

## Contents

- 中文版序言 /1
- 导论 /1
- 第一章 常人方法论 /14
- 第二章 “旧的”科学社会学的逊位 /58
- 第三章 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92
- 第四章 现象学与原型常人方法论 /145
- 第五章 维特根斯坦、规则与认识论主题 /192
- 第六章 分子社会学 /240
- 第七章 从本质到特质：常人方法论对工作的研究 /309
- 结语 /358
- 人名索引 /370
- 主题索引 /381

## 导 论

没有人会怀疑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科学通常被认为担当着激发技术转换、人口增长以及刻画现代社会面貌的经济生产和资源增效的各种重任。与此同时,似乎又没有人能清楚地说明科学究竟是什么以及科学究竟如何区别于其他的知识形态,科学究竟如何区别于比较普通的理性形态或实践活动,这些问题在科学哲学、科学史以及科学社会学中处于持续的争论之中。争论的参与者们现在甚至开始怀疑:我们把科学视为独立于经济利益、物质文化的内在统一的方法,把科学视为区分不同的亚学科如生物学、化学、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的特殊的技能是否有意义?曾经毫无疑问地确信科学必然与“纯粹”的政治观点、未经证实的猜测以及常识性信念截然不同的观念,已经开始遭受攻击。现如今科学的捍卫者们已经被迫去说明科学何以是无偏见的,或者被迫去解释科学何以不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展。【xi】

在这本著作中,我不打算对这些争论添薪助火,以便去建议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些关于科学、关于科学方法、关于科学与常识之间关系的更确切的概念。我无意解决“科学”的界定问题,无意解决如何使科学区分于其他的理性形式和实践活动的科学分界问题。我所要做的是:尝试一种研究科学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去辨析(respecify)<sup>〔1〕</sup>那些经常出现在关于科

〔1〕 这个术语来自于哈罗德·迦芬克尔,“Respecification: 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 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 logic, reason, meaning, method, etc., in and as of the essential haecceity of 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 (1)—an announcement of studies”, pp. 10-19, in G. Button, ed.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简要地说,在这些主题中我所理解的“辨析(respecification)”,不是对一个术语的意义的重新界定,而是研究在诸如“秩序”、“逻辑”、“意义”等中存在的各种不同活动的逻辑的和实际的相关性的一种方法。

学的讨论中的主题,如“观察”、“表征”、“证明”以及“发现”等。这样一个议题【xii】,滋生自我自己感兴趣的两个专业研究领域: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它们通常都被视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部分”,常人方法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相对较小的研究领域。常人方法论一般被视为是对“微观”社会现象的研究,研究范围是在街道或家庭、商店、办公室等进行的面对面的访问;科学社会学则被认为是对诸多的现代社会建制的其中之一进行研究。在传统的社会学教科书中,二者都没有占据太大的空间。在社会学的核心地带,更多的关注给予了“较大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力量,这些社会的和历史的力量引发并维持着经济生产、劳动市场、官僚组织、宗教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的系统运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明晰划分中,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也处在边缘地带。两个研究领域都以不使用新近发展起来的数据分析的量化方法而著称。<sup>[1]</sup>通常二者使用一些“软”的研究模式,诸如历史案例研究、人类文化学研究、访问研究以及文本批判等。

常人方法论与科学社会学恰好也是我自己的两个工作领域,很自然地我会倾向于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在本书中我也是这样做的。尽管我认为专业科学社会学家应该更多地关注这两个领域,但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说服社会学家为这个主题分配更多的空间。我更感兴趣的是强调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之间的跨学科的关联。我认为,这种关联的意义不在于他们都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在于二者彼此交织在一起的认识论关注。对于知识生产的研究,它们给出了极具特质的认识论方向。与此同时,它们促进了对科学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的结果与本质的当代讨论。

【1】曾经有一段时间,科学社会学家也参与发展了社会计量法在网络分析中的应用。像 Nicholas Mullins, Diana Crane, Derek De Solla Price 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通过系统地再现不同的研究报告之间的引述图式,对不同的科学领域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绘制了圣经测量地图(bibliometric maps)。例证可见:Y. Y. Elkman, J. J. Lederberg, R. K. Merton, A. Thackray and H. Zuckerman, eds., *Toward a Metric of Science: The Advent of Science Indicators* (New York, Wiley, 1978).

## 社会学与跨学科的批判话语

当下,社会学面对着一种非常有趣的整体环境。伴随着为数众多的来自历史领域、哲学领域、文学领域的跨学科的批判讨论的出现,众多学者和【xiii】研究者开始认同社会实践的突出重要性。因为缺乏更好的术语,在这里我使用跨学科的批判话语(transdisciplinary critical discourse)来言说各种各样的来自哲学、法律、文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反基础主义以及“后什么主义”运动,如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约定主义等。这些运动与对福科(Foucault)、哈贝马斯(Habermas)、德里达(Derrida)、伽德默尔(Gadamer)、罗蒂(Rorty)、巴塞斯(Barthes)、德鲁兹(Deleuze)、利奥塔(Lyotard)以及先前时代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海德格尔(Heidegger)、庞蒂(Merleau-Ponty)、本雅明(Benjamin)和杜威(Dewey)等著述的挪用和批判密切相关。

尽管公正说来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遗产最好被认为是反认识论的,但通常认为对“认识论”关注的意义是要把各种各样的反基础主义研究和争论的线索统一在一起。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说,在所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生物学、考古学以及其他的自然科学领域)<sup>〔1〕</sup>,伴随着女性主义以及文本批判的其他政治形态的涌现,文本批判

〔1〕 参见 Sandra Harding, “Is there a feminist method?” *Hypatia*, (1987) 17 - 32;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1988): 575 - 599; Evelyn Fox Kelle,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ison Wylie, “The constitution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gender politics and science”, in P. Galison and D. Stump, eds., *Disunity and Contextualism: 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and Athena Beldecos, Sarah Bailey, Scott Schaert, Karen Hicks, Lori Kenschaft, Nancy Niemczyk, Rebecca Rosenberg, Stephanie Schaertel, and Andrew Wedel (The Biology and Gender Study Group), “The importance of feminist critique for contemporary cell biology”, *Hypatia*, 37(1988): 172 - 187.

已经和社会批判融为一体,认识论/反认识论已经深深地文本化、社会学化<sup>[1]</sup>。社会学关注的传统主题,如种族、阶级、性别、权力、意识形态、技术、符号交流以及语言的社会环境等,已经被遍及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数不清的讨论和争论所充斥。

与此同时,这些争论的参与者们似乎极少认为他们的争论值得去参考《美国社会学评论》以及相关的专业期刊的内容。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学研究成果中最新近的社会学模型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的最新成果,比互不相干还要更糟。它们是反基础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极力批判的特定的话语症候群。还有,像种族、阶级、性别这些行业术语,在公共话语中处于极度的争议之中。为了在解释模型中把这些概念视为各种变量,对这些概念需要进行去政治化处理。在当今的政治讨论和学术讨论中,参与者们已经开始限制使用这些术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学家都沿袭着统治美国社会学研究的科学路线。对社会现象定量的和理性化的研究方法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诅咒,社会学领域目前正承受着日益加重的时代危机。像以往一样,危机涉及:社会学究竟应该把自己视为一种新兴的“幼稚”科学,还是应该进行一种更激进的解释性的和人文性的研究?然而即便是这一争论也已陷入在反基础主义那里已经没有地位的旧有的矛盾之中。关于分析的微观尺度对宏观尺度、结构对力量、科学对人文、定量方法对定性方法,是在重述着被当代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们已经搁置一旁的概念对立。在这些争论的晚些时候,日益增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接纳后约定主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著述,但是他们的努力似乎总是被视作其他领域早已进行的长跑练习的无力的模仿。在其他众多领域都在经历着“社会学转向”的当今,对于应该作为前沿的社会学的发展来说,这种状况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

[1] 我所谓的跨学科批判话语广泛地被认为是一种“左翼”立场,因为它似乎与那种对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批判最为相匹。然而,是否真是如此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反基础主义的支持者们强调:认为“激进的”认识论和“激进的”政治是日常事业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参见 Stanley Fish,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0.

由于不同的原因,对于我上述提及的专业社会学研究,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是一个例外。在常人方法论得到普遍认可之前很久,常人方法论的研究者已经大量吸收了胡塞尔(Hussel)、海德格尔、庞蒂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于话语以及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而在新近,科学社会学家也卷入了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学密切相关的“新的运动”。库恩(Kuhn)、波普尔(Popper)、拉卡托斯(Lakatos)、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波兰尼(Polanyi)、汉森(Hanson)、图尔敏(Toulmin)以及新近的哈金(Hacking)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科学社会学的当下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认为,科学社会学家对于在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中出现了对跨学科的科学叙述和实践“技能”的研究,贡献不菲。

在跨学科的批判话语中,像其他的贡献者一样,常人方法论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遭遇着“这样一个古老的矛盾,即真理究竟是完全独立于任何地方性的、局部性的见解的东西,还是某种地方性的、局部性的观点显然地渗透其中的东西”〔1〕。通过尝试描述“社会秩序”的成就以及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建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倾向于后者的立场,即反基础主义。在尝试描述或解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实践中,他们无一例外地放弃使用关于真理、合理性以及自然实在的超验标准。【XV】

尽管常人方法论者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非常熟悉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但与其他哲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相比,他们的研究还是更具有“经验性的”特征(无论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经验性)。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处理关于行为的研究案例;他们更多地关注细节;他们尝试去描述或解释可观察的(至少是可重建的)事件。鉴于与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内在关联,诸如经验性观察和解释这样的术语就备受质疑,但是有一点应该清楚,那就是:常人方法论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和语言使用与实际行为的“实际的”情境极为协调。相比较对现代性的本质和发展进行总体性总结或者对科学家及发明家撰写的出版物进行审视而言,他们的研究更有助于

〔1〕 参见 Stanley Fish,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Change, Rhetoric,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y in Literary and Legal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5.

我们对语言、科学以及技术的更精细的认识和把握。

伴随着战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对叙事和实际活动的兴趣的复兴,哲学家和其他学者开始关注传统的关于合理性、实践理性、意义、真理等认识论主题,认为知识不能从广泛而多变的语言和实践的环境中孤立出来,在其中理性由于行动被赋予,规则由于行动被唤起,意义由于行动被明晰,真理由于行动被需要。超越早期的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日常语言哲学家的理想化、典型化的研究,当代研究学者更关注各种“实际的”运用。例如,当代的科学哲学家越来越依赖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1〕,而一些长于分析的哲学家则开始向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寻找灵感与方向〔2〕。

哲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则特别与我的研究相关,像罗蒂(Richard Rorty)和麦卡锡(Thomas McCarthy)这样的哲学家指出:哲学研究应该吸收文化人类学以及与“语言游戏”的经验研究相关的一些成果。在讨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中,麦卡锡非常简明地对此进行了总结:“对于合理性和认识论权威的明晰不会来自于各种超验的论断,而是由对知识产生的实际活动的丰厚的人类文化学说明来提供。‘如果我们理解一个语言游戏的规则,我们就会彻底理解语言游戏的每一步究竟为什么会是那样。’”〔3〕

就像麦卡锡继续陈述的那样,对于情境规则的使用以及对于实际活动的反基础主义研究,常人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

〔1〕 例如,参见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Toward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2〕 参见 Paul Churchland, *Scientific Realism and the Plasticity of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Thomas McCarthy, “Private irony and public decency: Richard Rorty’s New pragmatism”, *Critical Inquiry* 16 (1990): 355–379, 引文在第 359 页, 引文来自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74.

## 支离破碎的纲领和复杂纷繁的交织

如果我仅仅借助于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的文献单纯地展示其连贯的内容,本书的写作任务就会相当轻松。遗憾的是,我不打算这样做,因此,在为说明的目的而对二者进行重构的同时,迫使我展开对它们的内在批判。到目前为止,我的描述似乎基本上把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视为就某一论题而言已经明晰统一的学科。事实上事情远非如此。尽管两个领域都非常小,而且大多数从业者彼此都认识或者至少听说过,同时两个领域都各有其特色期刊和公认的标志著述,但是二者没有任何一种内在统一的认识论信奉。无论是常人方法论还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都包含着支离破碎的研究纲领,但两个领域又同时在整体的认识论信奉中落脚。实际上在形式主义与反基础主义、价值中立与意识形态化、探索的实证主义与反身性模型之间的这种已经熟知的划分,在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争论文献中都出现过,而且每一熟悉的观点实际上在语言哲学中、在科学中、在行为中,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都已经得到过挖掘和扩展。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解释困难,使得对两个领域,特别是对常人方法论的理解变得格外困难。这种困难在这两个领域的最杰出的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尝试以一种创新的方式进行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同样困难。当下,在根本没有厘清两个领域最基本的思想的前提下,各种各样的研究在常人方法论和“新的”科学社会学的旗帜下进行。结果自然是,在我刻画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时,我必须格外谨慎。事情还不只如此,为了弥合跨学科共同体中两个领域的学者的研究工作,我必须进行大量先期的批判性的准备工作。

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中不同纲领的复杂纷繁的交织,也加剧了我的说明的困难。就像我将在第一章要解释的那样,常人方法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由迦芬克尔创立,随后作为研究日常话语和实践理性的具有现象学启示的研究纲领而被熟知。从一开始,迦芬克尔和他的同事

【xvii】



们就因为其对既成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批判而声名狼藉,然而,他们的批判以及常人方法论研究发展起来的一些理论性主题,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和观点。

在20世纪70年代,不列颠的一批学者扩展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开始研究“精确”科学和数学领域中知识的社会性生产。早期的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主要是纲领性的研究和历史性的研究。但是到了70年代中叶,一些研究者把当代科学实验室视为“建构”或“制造”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的场所,他们开始进行一种所谓的“实验室研究”:围绕着一些早些时候文化人类学和常人方法论在研究其他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主题,他们组织起了可观察的研究。

几乎就在同时,但的确是沿着独立的发展道路,迦芬克尔和他的几个学生开始认真地关注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数学家们的实际活动与话语。尽管他们的这些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亲缘关系,但是,在许多重要方面它们有着显著的不同。要明晰这些不同将会非常麻烦,因为迦芬克尔和他的学生们发展出了在许多重要方面不同于常人方法论纲领的研究。

一般来说,术语“常人方法论”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它通常非常随意地被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情境性社会实践的人类文化学和解释学研究。在认识到要试图将“真正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和各种各样的“似乎是”常人方法论的研究区分开来,会是一件繁琐而无意义并且容易引起内讧的事情的同时,我认为依旧有必要对常人方法论究竟做些什么以及常人方法论会带给我们什么进行澄清。尽管正如我所说的,对于传统的认识论主题,常人方法论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给出了一些独特的经验性研究(尽管必然不会是经验主义的和基础主义的),它们最基本的思想根基依旧被这两个领域的最新发展所波及。就在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开始被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更广泛领域所认可的同时,科学社会学的建构主义陷入对自身研究的质疑。这种质疑所涉及的通常称为反身性的东西损害了曾经激励对科学的“实际的”活动进行研究的那些原初的力量。

与此同时,尤其是在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体制社会学的旧有纲领,